

40 1977—2017  
周年纪念 40周年

## 408 我的宿舍我的“家”

何晓玲

1978年3月6日是个晴朗的日子。那天早上,我早早起来去吃饭。跟食堂的师傅们一道别后,看到院里开“大屁股”车(那时对从后面双开门的老式吉普车的“爱”称)的师傅已经等着我了。

4个月前,食堂的师傅一大早起来给我们做饭,让我们吃得饱饱的。院里的130带篷卡车把我们40多位年轻职工中报名参加高考的13人送到了武汉15中考点。最终,我们中的两个人,“一文一理”拿到了录取通知书。考取医学院的同事家在当地,只有我从单位出发报到,院里专门派了小车送我。

我要去的目的地不远——武汉大学。最初报考时,在新闻学和医学之间反复踌躇,后来决定选择新闻学却退而求其次报考了中文系的我,最后进了历史系的门。迎接我的是系里75级的一名男生,他帮我把行李搬到空无一人的“新家”——桂园8舍408室。作为“前辈”,他周到地帮我选了靠窗的下铺。不过周到之中也有疏漏,这张床板有些松动,我的上铺——来自军人家庭的副班长来了之后,在吱吱嘎嘎、摇摇晃晃中,本来睡眠就不好的我,几乎每晚都要挣扎到深夜才能入眠。

在我之后来的是很像“林妹妹”的姑娘,她选择了我对面的床。她跟我不同,睡觉时不怕打扰,再怎么嘈杂的环境都能睡着。于是,善良的“林妹妹”主动提出跟我换床。睡在她上铺的“大姐大”是班里年纪最大且“官”最大的,睡觉很安静,因此我的睡眠改善了很多。

我们4个人,加上睡在靠门边两张床的文子、明姐和不住校的“石头”,构成了408室的“一家人”。全年级3个班90多名77级新生年龄相差12岁,但408室老大和老末仅差7岁。

在宿舍、教室、阅览室“三点一线”的标准化生活里,我和“林妹妹”属于“屋里墩”,6个人的宿舍常常只有我俩留守。我们曾欣赏过本系、外系、低年级、高年级男生给“林妹妹”的款款深情或豪情万丈的小文章;也蹲在“家”里却各自丢失

了一件晾在露台上的衣裳。那年夏天,我俩还搬着小板凳在校图书馆后坡的树林里复习政治经济学,最后双双考出全年级最高的98分。

上大学前,我在下乡两年后被招工到珞珈山下东湖之滨的单位工作了近3年。在野外勘探队工作的父母先后给我运来了两口木箱和几块铺板。箱子装衣物,铺板是方便我于武汉的“火炉”季节在室外乘凉用。12月考试到1月参加体检,单位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接替我。春节后,我从家探亲回来的第二天,录取通知书到了。我所承担的几项工作:打字、收发、办简报、做会议记录、管理图书室(非业务书籍)和广播室等,最有技术含量的是打字。即使有了接班人,也要掌握基本操作要领,记清3000个常用字在字盘上的位置不是一朝一夕的事。所以,单位领导在我报到前跟我商量,东西可搬可不搬,宿舍还保留着,关键时刻也要回来帮忙。就这样,单位虽然派车送我报到,我的东西却没有全部拿走。这就有了我和“林妹妹”两个人回单位抬木箱,一口空箱子却让我俩不知歇了多少口气才搬到学校体育馆旁的操场。为了能在408室旁边的露台上乘凉,我和年纪最小的文子回单位搬铺板。可还没出单位大门,文子就差点摔倒,最后院里的救护车司机用救护车把我们送回了学校。

还有一天晚上,我、“林妹妹”和明姐结伴去医院为同学们取纱布、松节油等药品,因时间太晚不敢回校,我们三个在医护值班室里躺了一夜,第二天早上急忙赶回去出早操,却被班长发现,受到了严厉批评。过完大一初二,基础课和两大通史已经学得差不多了。大三开始,学校作为教育部试点推进学分制,我们系成为试点之一。首批推出的选修课有4门,分别是哲学系的形式逻辑、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图书馆学系的古籍整理与版本、中文工具书使用方法。这些课原本是为了给学生学习不同专业方向作参考,我却傻傻地将4门课全部收入囊中。大三下学期,我又选了哲学系的欧洲



作者简介:

何晓玲,女,历史学硕士,高级编辑职称。先后于1982年和1987年本科、研究生毕业于武汉大学。曾任湖北大学、中华女子学院教师;民政部社会福利与社会进步研究所社区研究室主任、《中国民政》杂志副主编、《中国社会报》社会部主任、《社区建设周刊》主编、社区建设研究中心主任等职。现为江汉大学外聘教授、中国社会工作实务研究院副院长。著有《社区建设模式与个案》、《现代社区制度实证研究》(合著)等。

哲学史、法学的国家与法原理、经济系的世界经济等主干课程,以及外文系的中国文学史、中文系的外国文学史等附属课程,还有第二门外语等。我俨然成为了一名“学霸”,最多的时候,同时有8门课考试。进入大四,我的学分已修满,但我还是选修了本系老师专门为高年级的选修课——美国政治制度史、美国工人运动史、西方史学史等。那时,我就已经明确自己要向世界近现代史方向发展。

我天天忙着上课、复习、考试,“大姐大”还应我要求,给我找了一份校广播台大学生生活节目组的编辑工作。隔三差五地,我还要听讲座:吴于廑先生的“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”,刘子健先生的“推同制”研究,金观涛等人的“历史控制论”等。我在“屋里蹲”的时间越来越少,跟同学的交流也日渐稀少。但是有一天,他们给了我一个“突然袭击”,一个意外的惊喜。

1980年中秋节,班里团支部组织的中秋活动是“生日晚会”:他们用月饼(每人一块)堆成一个蛋糕的形状,再把一小截一小截的蜡烛点燃摆在上面,然后请“寿星”上台吹蜡烛、唱歌。

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,我被“石头”推上台。很多年以后,还有同学记得我那天唱的是“中秋月挂天上,映木楼照小窗……”。而我也永远记得几十年唯一一次“组织”和全班同学给我过的生日。

数年后,做高校教师、读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生、又做回高校教师的我,终于实现了自己最初学新闻的梦想,成为了一名编辑,并获得了新闻出版署全国职称评审委员会授予的高级编辑职称。408室的姐妹们,“大姐大”成了北京某出版社的编辑,副班长、“石头”、明姐和“林妹妹”分别在武汉和长沙的几所高校任教,文子去了加拿大。

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,先后有了属于我们系77级全体同学的校友录主页、QQ群、微信群。大家可随时线上聊天、线下聚会。同学间有了更多接触和了解,建立了更深厚的情谊,成为了一辈子的亲人。

若干年后,当我离开新闻采编工作岗位,作为退休人员受聘于高校时,我所在的办公室也是408。

正如陶渊明先生所说:“此中有真意,欲辩已忘言!”

## “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”征文启事

征文要求如下:

1. 来稿者为恢复高考制度后参加过高考者。
2. 文章为第一人称自述文。文章讲述真故事,抒发真情实感,有细节描写,能感动人心。

3. 篇幅在3000字之内。

4. 来稿文章写明作者姓名、单位、手机号码等联系方式。请随稿提供3至4张本人当年高考时与近期照片,并附个人简历,300字内即可,可写

个人经历、著作等。

5. 征稿即日开始,2017年12月31日止。来稿择优刊登。来稿请寄:E-mail:

Esther0329@yeah.net 或

ongbianshi@bjecan

报社地址:北京市海淀区志新东路9号A座北京考试报社总编室收(100083)

本期  
协办首都医科大学  
www.ccmu.edu.cn

## 微观校园

在基层起步  
做伟大事业

新疆和田县塔瓦库勒乡有个巴克墩村,村里有位70岁的农民。

“他在村里落户时,没有通电,也没有水。20年过去了,村里发生了巨变,铺上了柏油路。他现在种着30亩地,过得很舒服。他谈起这些变化,差点哭出声来。”9月21日,吐尔孙·艾拜用朴实的语言,讲述了他在新疆开展“访惠聚”工作、在巴克墩村驻村的情况,为“一位维吾尔族博士的成长和心语”研讨会开了场。

吐尔孙个子高大,为人诚恳。无论是讲述他个人经历的故事——《从中专到清华园》,或是他发表的一些研究思考,都在网上和线下引起了热烈反响。

“过去我更多待在象牙塔里,对社会现实情况不理解、不了解。到南疆以后才感到,离基层越近,离真理越近。”吐尔孙说,“我们必须到基层去,看老百姓的情况,听老百姓的想法,才会知道国家走到现在多么不容易。”

正是了解了新疆基层农村的真实情况,吐尔孙决定把自己的所见、所闻、所思、所想说出来,于是有了引发社会各界关注的几篇文章。

研讨会上,清华博士生导师、教授李彬对爱徒赞扬有加。他说:“吐尔孙无愧于清华大学的培养,符合我们对博士生提出的‘顶天立地’的要求——顶理论之天,立实践之地。”

“回到家乡,不仅是学术问题,更是在社会环境中成为中流砥柱、维护民族团结、维护国家统一的问题。”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原党委书记王健华说:“我从心里佩服他,在最基层工作,做最伟大事情。”

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韩毓海说:“我从吐尔孙·艾拜的身上,看到共产党人的精神。”他认为,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基层唤起力量,不仅因为改善了基层群众的生活,更因为认真倾听了他们的诉说。吐尔孙深入基层,倾听村民的心声,才能写出朴实又深刻的文字。

这次研讨会的主办方是中信基金会。它以“坚持实事求是、践行中国道路、发展中国学派”为宗旨,连续3年为优秀博士生、硕士生提供奖学金,鼓励他们在学术上有所建树,认真研究中国的“真问题”。吐尔孙就是受益的博士生之一。

研讨会刚一结束,吐尔孙就立刻赶往机场,踏上了返回南疆乡村之路。他坚信,这是青年学者成长的必由之路。

(铁铮)